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陆胤 著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

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 术 | 史 | 人

陆胤 著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

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陆胤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24150-9

I. ①政… II. ①陆…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IV. ①B24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1327 号

本书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书 名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

著 者 陆胤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50-9/K · 10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插页 2 37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序一

夏晓虹

自本科三年级，陆胤获得北京大学“校长基金”资助，开始尝试进行学术研究，本人即担任其指导教师。此后，由学年论文、学士学位论文直到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导师，陆胤每个阶段跨越式的进步始终令我惊喜。

身为中文系毕业生，陆胤在古典文学方面经过系统的训练。而其勤奋与悟性，又使这些习得的知识转化为难得的修养。尽管由于我的专业领域集中在近代，陆胤的研究方向亦逐渐向此段集中，但其本科学年论文之讨论清代的“忆语体”文言小说，学士学位论文以《王闿运的拟古诗与近代中国之“汉魏六朝”》为题，嗣后又担任过以交流旧体诗文创作为主的学生社团北社社长与《北社》杂志主编，这些历练足以显示陆胤在古诗文研习上的用功与收获。

2003年秋季学期，陆胤申请的近代方言小说研究的课题因具有学术竞争力，被列入“校长基金”资助项目。次年春，这篇题为《从方言书面化看近代说部的双向意指》的论文完成，获得了本科生科研优秀论文奖。多年后经过修订，此文又以《作为“教科书”的苏白小说》之名发表在《汉语言文学研究》杂志，足见陆胤初入学术之途，便有不俗的表现。现抄录我为该论文

结项所写的评语：

小说的语言分析一向是小说研究中的难题。陆胤以近代苏白小说为论述对象，体现了其学术眼光的独到与相当的研究实力。

自从1920年代，胡适将《海上花列传》定义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以该小说为代表的吴语小说即引起学界的关注。胡适从构建“国语文学”的理念出发，将方言小说纳入与“死文学”——文言相对立的“活文学”脉络展开论述，故更看重其传达人物神情口吻的生动逼真。此后的论者虽在方言运用的阶级分层与地域色彩上有所推进，但多半流于表面现象的罗列，而难以深入。

陆胤的论文却能独辟蹊径。受国外跨语际文化研究的启发，他将苏白小说语言功能的剖析放置在晚清狭邪小说功能转换的背景中考察，便获得了一种新视野与研究的推动力。

作为论文预设的前提，作者从近代狭邪小说由内在的身世寄托外转为社会教育的手段的历史清理入手，分别选取了《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沪江风月传》三部代表性作品，意在透过对1890年代至1920年代苏白小说的动态分析，揭示不同时段的狭邪小说，其社会教育功能如何借助各个文本中语体对立与语体分用的使用得以实现。整篇论述层层展开，思路清晰，言之成理，显示出作者对理论与文学本文的契合具有相当敏锐的感悟力。

论文语言精到，撰写规范，注释详细，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学风与研究、写作能力，是一篇优秀之作。（2004年3月28日）

而本科三年级期末写成的学年论文，没有循此路径继续开发，陆胤转换了目光，投向由冒襄的《影梅盦忆语》开启的“忆语”书写系列。我为这篇题为《近世第一人称文言叙事的拓展及其限度：以“忆语体”为中心》的论文也写过简短评语，如下：

陆胤的论文以绵亘整个清代的忆语文学为考察对象，以第一人称叙事为研究角度，探讨其在中国叙事史上的开拓及其限度，就选题而言，可谓别具只眼。

论文既借鉴西方叙事学及自传研究的诸家理论,又能够因应对象而有所调整。作者思辨能力之强,予人印象深刻。而其在前期资料准备上的扎实,亦令人称道。

全文紧扣主体意识与文本叙事秩序(即“第一人称”与“情节组织”)两条交织的线索展开,清晰地呈现了从冒襄的《影梅盦忆语》到程善之的《倦云忆语》中第一人称叙事的演化,着重讨论了忆语体文学对私人情感空间的开拓、回忆的真实性、文本的情节建构诸问题,选点准确,论述深入。而其以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之分析作结,则为纪实类的忆语转向虚构类的小说建立了合理的通道,使论文完成了历史研究的初衷。

本文具有很强的理论预设性,并以之观照材料,在文本分析上多有新见。但亦因所论者大,偶有照应不周及缠绕之处。

论文结构合理,思路绵密,文字老练,注释规范。(2004年5月23日)

当四年大学课业结束时,陆胤的学位论文选题又从白话、文言小说出走,转移到旧体诗歌,由此可以看出其有意识地触摸各种文学传统的企望与努力。2005年6月2日,我为这篇《时代的转义:王闿运的拟古诗与近代诗学之“汉魏六朝”》写了评鉴意见:

本论文的写作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希望追踪古典诗学在近代的时代转义,以考索旧学家如何应对新时代。为此,陆胤选择了看似最为守旧的王闿运所作拟古诗为论述对象,在一种推至极致的传统形式中,力求揭示出含藏其间的转化趋向。

在确定了思路之后,陆胤又能沉潜到文献的阅读中,除王闿运的诗文集外,对其日记、年谱及师友著作亦广为涉猎。特别是在版本的考究、引文出处尽量择用最早的文本上,不仅从细微处体现出陆胤严谨的治学态度,亦因其真正占有了丰厚的第一手资料,而使整个研究得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正是凭借对文献的熟悉,在论述中,陆胤能够自如地穿行于文本内

外,将诗作、文论与王闿运个人的身世经历融为一体,精细地进行剖析、考辨,在层层推进中不断深化论述。其中尤以对“以词掩意,托物起兴”这一王氏重要诗学观念含义的抉发,以及《拟古十二首》之质疑陆机拟作的阐说,最为精彩。

应该说,在一个阅读与分析难度都相当大的论题上,陆胤能够有拓展,有新见,基本达成了预期的目标,这很不容易,由此也显示出其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与训练。

至于论文的不足之处,则是因理论预设过强所带来的某些解释的略嫌生硬,如对于“今诗为己”的分析。

但总的说来,这仍然是一篇优秀的学士学位论文。

由于本科阶段成绩突出,陆胤经由推荐,成为中文系第一批直博生。入读研究生后,陆胤更着力打通文史。由追索“同光体”之幕府士人背景、近代政论杂志上诗文栏的意义,进而探究近代两大学术宗师章太炎与梁启超“新史学”观之离合,论题涉及文学史、政治史、报刊史、学术史等,研究的路径日益开阔。其间,到京都大学访学一年的经历,得益处不只在语言,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致也令其大受启发。何况,日本经验对于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影响,更是可以长久享用的学术命题。尽管直博期间,陆胤已开始动用这份丰厚的资源,发表了《明治日本的汉学论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之发端》与《从“汉文训读”到“东瀛文体”》等文,但其光大发散仍须期诸日后。

最终,经过几次翻复、推敲,陆胤的博士学位论文确定为《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张之洞学人圈考论》。我很看好这一研究前景,故评语也写得格外用力:

本论文在两个方面面临挑战: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是一个极具魅力但难度很大的课题,对于研究者的学养与学识有高度的要求;督抚作为总揽各省或区域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异常庞杂。而陆胤以张之洞学人圈为考论重点,又集注于其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作为与意义,由此显示出足够的学术魄力与知识准备。

而论文整体所展现的思路值得特别关注与肯定。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中央政府的举措,但对同、光以来逐渐坐大、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的作用则少有究心。陆胤于此处发力,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地方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而且因其地位的上下勾连,从而使得经过本论文描画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

作为此项研究的理论构想,陆胤发明了“缓冲模式”这一核心概念,以概括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圈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的位置与作用。此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有效地阐释了这批并非“先进”的封疆大吏与“清流”学者,在晚清异域文明与本土文化传统相遇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能,是即论文所着力论析的将外来新知识、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与普及化的实在功绩。这也是本论文的精义所在。

其学术思路与理论预设在各章的论述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开与落实。自第二章始,论文分别讨论了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对地方学统的吸纳与整合,其扩张与清末学制改革的关联,以及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对于日本文教经验的迎拒。其间又涉及到相对被忽略的同光学术进路及其地域分化,江、鄂联手对抗北洋的督抚派系之争,以及近代国族意识与传统政教伦理在“国文”学科确立与文体辨析中的合力等重大问题。而经由学风引导、学制建设与文体厘定一系列举措,张之洞学人圈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留下的印记得到了清晰呈现。

陆胤的论述也表现出很强的辩证思维特征。其并不将传统一概视之为“旧”,而常常在传统中发现“新”意。因而,论文对于传统学术文化在新制度、新知识建构中的隐性滞留与融合尤为敏感,且论述中肯。这固然本为“缓冲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可以见出陆胤同学在古典学研习上的用功。而其论文中一些论断的不够明晰,显然也与此一思考习惯有关。

论文在先行研究与资料使用上很见功力。借评述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而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同时也展示了作者的识断能力;所用资料不仅采自己出版的大批文集、年谱、日记、笔记、史料汇编等,也博涉档

案、书札等未刊资料,故取材丰富。而《张之洞学人圈名录》的编制,则化繁芜为清爽,对论文正文有补益之效。

这篇导师意见正好写于距前一节文字六年以后的同一日,真是巧合。

陆胤这部博士论文经过修订,现更名为《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即将出版。相信经过两年的沉淀、打磨,其著述境界当更有提升。作为指导教师,我自然乐观其成,故缀集历年所写论文评语,以见作者之学程旅痕,并为其书推介。

2013年11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序二

杨国强

张之洞由探花（一甲第三名）作翰林，而十八年京官生涯里的声光动人，则大半出自“遇事敢为大言”，以议论发舒“号为清流”。其间，他典试浙江、四川，而且两度督地方学政，又因“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门径”，已能于宦业之外自立一种作育士人的宗师风采。之后，从光绪七年开始的二十六年里，他由巡抚山西而总督两广，又由总督两广而总督湖广，并曾在时势不宁之日先后两次署理两江总督。比之居庙堂之高的言论发舒“纠弹时政”，这个过程以疆吏管地方，则不得不日趋日深地走入“时政”之中。在一个“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的时代里，本居“局外”的张之洞中途折入“局内”，便成了一身兼有两种阅历的人。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湘淮人物次第因军功崛起于内战，随后节制地方而布列南北，其间的出类拔萃之辈，遂成为疆吏中的强有力者。这些由战争选出来的人物与战争所造成的国家权力变迁互为因果，在咸、同之后的中国，营造出一种附着于地方的权力重心，以清代二百多年历史相比较，显然是前所未有的。与他们相比，张之洞既是后起，又属别类。但时当中西交冲之日而同处重心所寄之中，则张之洞在二十六年里眼到手到，由治吏、筹饷而

及开矿、炼铁、织布、纺纱、购枪、练兵，并讲求币政和谋划铁路之利等等，都是在从立言转到事功，因而是从清流转到洋务。生当外力苦相煎逼而了无穷期的多难之世，他由此而越来越为朝廷所倚重，也由此而越来越切近地与李鸿章一路同道。这个过程使一个出身儒学而恪守“重教之旨”的士大夫因中西交冲而识古今之变，并在古今之变里动心忍性，历经种种困而知之和学而知之。而后，西法、西艺、西政、西学便一个一个地成了迎拒西潮的中国人度量彼己的物事和采而用之的物事，其直接的结果和可见的变化，便是外来的东西不断地化为内在的东西。外来转化为内在，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过身来不得不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但这些东西进入中国，又自始已与儒学相逢于中国人的日常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并不能不引出两者间的彼此扞格和相互牵结。与之相对应，则是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屡见种种议论的各自表述和各色表述，而皆归其旨义于“中体西用”一途。这些议论以及议论背后的思考，都表达了移用西法的士大夫身在两者之间，从而是身在矛盾之间所共有的愿想之所在和公认的本位之所在。因此，“中体西用”反映的应当是一种群体意识。然而就当日的实际影响和后来的历史叙述而言，“中体西用”又常常与张之洞的文字和名字贴连在一起，谓其“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若以此对比主持洋务事业三十多年的李鸿章，显然是世人更多地把后起的张之洞看成是“中体西用”的典范和代表。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所反照的，正是能作形而上思维的张之洞比倾力于形而下之器的李鸿章更多文化意识，因此在中西交汇之间能够表现出更多的文化自觉。

迨甲午乙未之间中国重创于日本，丧师失地都化为“大野招魂哭国殇”。与这种愤痛相映衬的，则是久负“防海交邻”之重的李鸿章在万人怒骂之中一时跌仆，落入“坐困”之中。之后，张之洞赅赅乎继之而起，在晚清最后的十多年里成了疆吏中能够影响朝局而领袖群伦的人物。甲午以前三十五年，中国人由“庚申之变”引发审视彼己，渐知外力迫来促成的千古未有之“变局”。至甲午乙未，则中日战争的结局化作“焚如之灾”，已使“变局”急速地转为“危局”。与此同时发生并相为表里的，是三十多年来因中西交冲而识得古今之变的中国人，自这个时候开始又更深一层地从中西交

冲里推行出新旧之变和新旧之辨。于是而有戊戌年间新旧交争促成的变法起和变法落,计其时日,这种起落和起落之间的斑斑血迹与甲午乙未相隔不过三年。而其余波一路鼓荡翻腾,又导致了接踵而起的庚子之变,之后,八国联军带来的兵火和劫难,使已入“危局”的中国在仓迫中再变而入“残局”。张之洞继李鸿章而起,随之是身在这个过程中,又比李鸿章更深深地卷入了搅动朝野的新旧之争,并因之而在戊戌年间出入乎变法而前后徊徨;在庚子年间串联东南督抚共守中外互保而立异于朝廷。就其奉“中体西用”为宗旨而言,“中体西用”同时应是一种立脚的界限。然而五年之间,中国从“变局”到“危局”,从“危局”到“残局”,由此形成的亟迫厄逼,又常常会回应亟迫的中国人心长力绌,并因心长力绌而在中西和体用之间守不住常度。是以庚子后一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会奏,迭连“上变法三疏”并掀动一时。《清史稿》为他立传,于此一段贯连前后而总括言之曰:“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元,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尺度相度量,显见得中西间的界限与体用间的界限经此既“变”且“采”,已漫漶莫辨。比之戊戌年间危局来临之际的变法起和变法落,以及张之洞在起落之间的前后徊徨,则此日“变法三疏”之伸张除旧布新,已具见残局下的时随势迁和人随势走。而后是“变法三疏”成为一个起点,沿着“皆次第行焉”一路由此及彼,牵动朝廷和地方,牵动官府和民间。直接启导了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里绵延十年的清末新政。与之对应的,是晚清七十年里从未有过的深度社会变迁和剧烈的社会震荡。

张之洞为这个过程作始,又以其多端兴作宏开此中规模。然而这个过程循变中法和采西法而来,则一旦起于促迫,变中法和采西法都会成为自发之而自为之的内在动力,推引这个过程沓浪相逐而节节发皇。之后是以“变法三疏”为起点的除旧布新一定会越出“变法三疏”而愈走愈远,了无止境。若以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列名会奏,以学校与科举之不能两立为理由,吁“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的前后断为两截,对比他

在光绪二十七年与刘坤一合奏,主张用“学堂所取”以“分科举之额”为办法,期于“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尽减,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得以纳此入彼而成人才之途的新旧蝉蜕,显然是四年之间前后已经不能相同。一则记载说光绪三十一年会的会奏,是“议发于北洋而忠敏促成之”,奏折由“北洋主稿”。然则相隔四年,曾经为天下开先的张之洞,此日却像是在跟着袁世凯和端方走。这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说明了张之洞已不复再是这个过程里能够一路导引的人了。但袁世凯和端方一辈的后来居上,则在其提调和影响这个过程的同时,又一定会以其提调和影响引来异曲和异想,使这个本来自有次第的过程失其常度和失其常序。出自时人的另一则记载说,“试行宪法,袁世凯约赵次珊、岑云阶诸公联名出奏”,而“知其危险,不肯出名同奏者,张文襄也”。与“停罢科举”之跟着走相比,事涉行宪,则袁世凯的章法已不能与张之洞意中的常度和常序相对应,所以“不肯出名同奏”,正是不肯跟着走。由此反照出来的,是曾经为这个过程开先河的人与这个过程里的后来居上者之间各有取向。稍后由“创行立宪”派生“议改官制”,而“枢臣颇主其说”,张之洞以四千言为电文致军机处逐条驳诘,明示各有取向之演为断断相争,而总归之曰:

昔唐贤有云:天下本无事,乃庸人自扰之耳。洞窃以为不然。无事自扰,尚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以扰,则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扰天下?惟才敏气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察理不真,审势不明,贸然大举,乃能扰天下耳。宋王安石岂庸人哉?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第揆以民心,衡之物力,实不宜多有纷更。

“提倡甚力”和“倡办颇多”,说明了张之洞的自觉意识犹内在于这个过程之中。但“察理不真”且“审势不明”的“才敏气盛急于立功名之人”杂沓而来,涌入其间,并左右廷议而以“贸然大举”为人间造不宁和“纷更”,则又不能不使这个过程在张之洞的眼中与心中变得越来越陌生和越来越异己。七八年之间,中国人为除弊而开新,但由此所得的“扰天下”,显然是实证地说明了开新同样能够致弊和开新正在不断致弊。所以,这些论辩虽起于“议

改官制”，而此中内含的忿恚却显然统括多端，并不止乎官制。与之因果相寻，逐使陌生和异己都成了忧患之所在。许同莘为张之洞作年谱，说其光绪三十三年之行状曰：“科举既废，学者不复知中国文字可贵。于是湖北设存古学堂，奏折有云：道微文敝，世变愈危。臣殚心竭虑，筹计经年，商榷数十次，始克拟定大略，以存国粹、息乱源。”其恐惧尤在于“文既不存，道将安附”。时至此日，除旧布新所到之处，中体和西用之间的界限已节节残破。而此日之张之洞以“存古”立学堂，亟亟以求的是在“科举既废”之后留此一脉延“国粹”而“息乱源”，其心中的怀抱无疑全在为已经残破的中体西用之界作补苴罅漏。而由此返视两年之前他与袁世凯和端方合词奏议清罢科举的仓促亟切，则“道微文敝，世变愈危”的陈说之中显然不会没有深深的茫然和追悔。茫然和追悔都由新旧交争而来，又都反映了新旧之间的失路。

与此前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苦于守旧相比，这种产出于十年新政之中的茫然和追悔困于鹜新，其间的不同，说明了晚年张之洞比李鸿章更深地楔入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并因之而在“守旧者率鄙陋闭塞”之外，又须直面“言新者又多后进浅躁之流”，并且常常要和他们一起在同一个题目下做同一篇文章。由于庚子之变震荡人心，而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演为一世之走向，所以十年之间“言新”日益成强音，而“后进浅躁之流”日益成强势，随后是“浅躁”之“新”日益肆张而弥漫于朝野之间，唤起曾是“新学新政提倡甚力”者内心的惊愕、疏离、愤懑和排拒。张之洞七十一岁“奉旨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继之入京参政务。“时人以入相为公贺”，而究其内心，则“不知幽忧孤愤乃什百于平日也”。作为一种对照，当日舆论之描画，说的是“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以“先人而新，后人而旧”为张之洞作总评，自能见文字传神的精悍。然而其“十年前”之“先人而新”，犹是蓬蓬然以别开生面为愿想而常在回声四起之中；“近年来”之“后人而旧”，则是以一身拂逆时潮而左支右绌，常在力有未逮之中。与回声四起相比，拂逆时潮而力有未逮不能不与内心的茕茕孑立相随，从而不能不与举目四顾的落寞寂寥相随。然则

其后期位望日隆而“幽忧孤愤乃什百于平日也”，此中之心路显然是既与“后人而旧”为因果，又与“后人而旧”相表里。因此《抱冰堂弟子记》末了一段列叙张之洞暮年自述曰：“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这些话虽是追说往事，而表达的则是此日心境的疲敝和孤独。曾国藩晚年心苦，李鸿章晚年心苦，张之洞晚年也心苦。四十余年之间，这些人身在历史漩涡之中备尝艰难，而力行不息以造时势，又在力行不息之后饱受困蹇而为时势所扼，留下漫天的惆怅沮愤。从同治到光宣，他们在世路变迁里各苦其苦，而因果蝉联，其各苦其苦所衬映的，则都是中国人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中的重重曲折和起伏多难。

陆胤博士以张之洞及其周边人物群为主体，用心探究晚清中国的世运影响士林和士林影响世运，并积其读书有得，撰为《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一书。中国文化以道、学、政为次第以叙其先后轻重，然则学之于政，犹驾而上之。因此“政教”和“文教”的各自贯通与相互互联，本源皆出自一世之学。张之洞于老境侵寻之日曾对亲故说心事，而言之滔滔，重心都是自抉一生之向往不在宦途，而在读书：

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不意以阁学遂膺抚晋之命，旋擢督岭南，请枢臣代奏力辞，慈圣不悦，严词责之。及抵粤而海疆急，遂不能辞。海防既定，乃具疏引病乞罢。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又光绪十三年四月，又光绪十三年八月，凡三次上疏请开缺，皆不许。拟相机再上陈，闲居读书十年，始可再出任事，如司马温公，已官中丞，而居洛著书十八年；汤潜庵、耿逸庵，已官监司而解组讲学，皆可师也。适奉调任湖广之命，事由议奏芦汉铁路而起，不能辞，拟俟铁厂告成，即申前请。迟至丙申，始有商承办。而煤矿未定，商意不坚，牵挂无已。至庚子，而联军之变作矣，大局纷纭，至今未已，踬蹶支拄，遂至于今，魂梦忧劳，无非苦境。惟待目前重大数端略有畔岸，即当仰恳圣恩，速乞骸骨，即不能修老庄养生之道，尚可从容啸